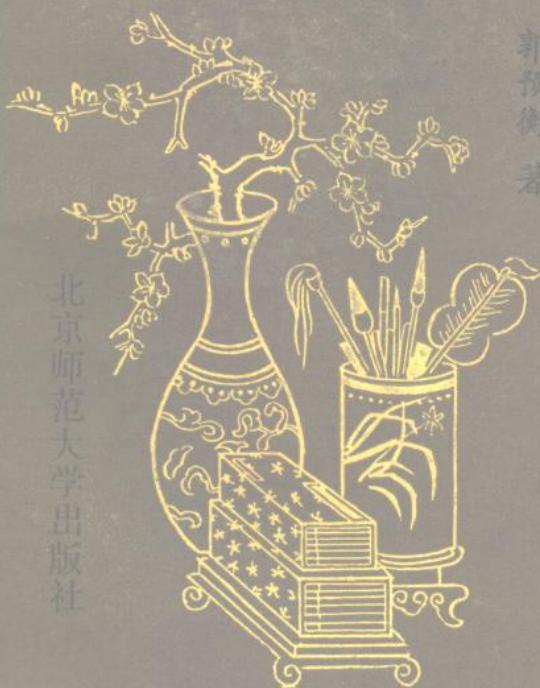


古代文学探讨集

郭预衡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7206.2/47

古代文学探讨集

郭预衡 著

D349.2-4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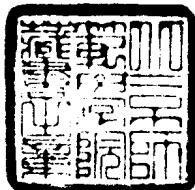


2082940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1.2

829408



古 代 文 学 探 讨 集

郭预衡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解放军 7226 工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875 字数：363,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

统一书号：10243·2 定价：1.75元

序　　言

这是我写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选集。其中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探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是关于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一是关于散文艺术的传统问题，一是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中国文学的历史悠久，但关于文学史的著作一直很少。在全国大陆解放以前，虽也有人从事过文学史的研究，但未能满足社会需要。正如鲁迅所说，文学史不应只是“资料长编”，而应具有“史识”。按现在的要求，也即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出科学的著作。解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者在这方面是作了许多努力的，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几个高等院校的同志们分别写了两部《中国文学史》，这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新的成绩，为以后文学史的研究打下了新的基础。在我读了这两部书之后，也就进一步考虑了一些关于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从而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这就是《谈谈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等三篇文章。最近一个时期，在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大家讨论问题，其中也涉及了文学史的编写，我于是又谈了一点临时的想法，很不全面，只是作为初步的探讨提出来的。

关于作家作品的评价，这是历来争议最多的问题。早在三十年代，鲁迅讲到古代文学时，主要也是评论作家作品。解放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讨论最多的，仍是作家作品的评价。例如关于陶渊明的评价，在三十年代，鲁迅就曾和某些学者有过争议，而且鲁迅曾经讲过非常全面的意见。但是，事过二十年后，这个问题竟又重新提出来了。对于一个人的

评价，古时曾有所谓“盖棺论定”的话，现在看来，盖棺也并不能论定。不但盖棺不能论定，甚至几代都不能论定。即以陶渊明而论，自从颜延之、萧统以来，不知有过多少评论；而到了三十年代、五十年代，还是争论不休。这就说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有发展的，一般地说，是随历史的前进而前进的，不过，实践证明，有时也有倒退。关于陶渊明的评价就是如此。三十年代初期鲁迅曾经讲得清楚的问题，到五十年代后期却又不清楚了。为什么呢？我看这一方面是同人的认识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同某一时期的社会思潮有关。我在这个时期写的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中，也有关于陶渊明的评论。今天看来，我当时的一些看法，主要是重复了鲁迅的意见。我的认识，即使不算倒退，却也不是进展。此外，有的文章，虽然曾经力求写得全面，但多少也曾受有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片面性也是有的。在这些评论文章里，比较能够代表我近时的看法的，是论韩愈和欧阳修的几篇。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作家很多，散文的数量很大；在从前的文论当中，关于散文的论述也相当不少。但近年以来，关于散文的研究比较薄弱。我觉得，中国的散文，由于历史悠久，作家众多，作品丰富，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很值得探讨。因此，这个时期我也写了一些关于中国散文艺术传统的文章。但这也只是初步的探讨。只是“略谈”，并不系统。其中较能代表我近时的看法的，是《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今后还想沿着这条线索探讨下去。

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是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的。近时有的文章似乎不再赞成“批判地继承”这一提法，但我写的这一方面的文章曾是主张“批判地继承”的。我曾认为，不仅今天的无产阶级要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就连从前的其他阶级也都是批判地继

承文学遗产。不错，在任何时候，都有人提倡“兼收并蓄”，但是，我也看到，提倡“兼收并蓄”的人，在实践上，却并不能真正作到。说是“兼收并蓄”，而事实上，却是有所不收，有所不蓄；或是收其所收，而蓄其所蓄。这正如人之对于食物，除非到了“饥不择食”的特殊情况，总是有所选择的。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更多思考的问题，今后应该进一步探讨。

以上四个方面的文章，曾是发表于不同的时期，前后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这次选入一集，只是作了个别修改，基本上保存了当时的见解。例如，同是谈《红楼梦》的爱情悲剧问题，写于六十年代的《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就和近时写的《神圣的家族，爱情的悲剧》有不同的看法。两篇文章反映着我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历程，因此，对于前一篇的看法，也就存而未改。

这个集子本来只选关于古代文学的文章，但鲁迅先生对于古代文学的很多真知卓见，我以为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补正我的文章的疏漏和错误，也就把我探讨鲁迅论述古代文学的几篇文章收在里面了。当然，我对鲁迅著作的理解也不一定准确，这同样是希望就正于同志和读者的。

郭 预 衡

1980年12月1日

目 录

1984.9.26

- 序言 (1)

第一部分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

- 谈谈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 (3)

——读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

“秦汉文学”一编

- 论唐代几个作家的评价问题 (12)

——读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

“隋唐五代文学”一编

- 从“魏晋南北朝”一代谈文学史的编写问题 (24)

——读文学研究所新编《中国文学史》

- 关于文学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38)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

- 鲁迅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观点和方法 (48)

第二部分 关于作家作品的评价

- 陶渊明评价的几个问题 (65)

——在讨论会的发言

- 评《陶渊明传论》 (70)

- 《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 (83)

- 《文心雕龙》论一代文风 (106)

- 论杜诗思想和艺术的主要特征 (119)

- 评胡适所谓“老杜的特别风趣” (137)

- 韩愈评价的几个问题 (143)

杰出的散文家韩愈	(160)
论欧阳修	(177)
读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	(208)
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	(216)
李清照短论	(226)
再论李清照	(229)
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	(238)
从对辛弃疾词评价的一个问题谈起	(248)
再谈对辛弃疾评价的一个问题	(257)
怎样看《水浒》一书的思想矛盾	(270)
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273)
神圣的家族，爱情的悲剧	(284)

第三部分 关于散文的艺术传统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299)
千古文章重“白描”	(305)
如何对待论战的散文传统	(308)
略谈我国的散文传统	(313)
史家之笔，策士之辞	(317)
——先秦散文探索之一	
东鲁春风，南华秋水	(325)
——先秦散文探索之二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332)
——汉代散文探索之一	
行云流水，姿态横生	(338)
——读宋代散文随笔之一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344)
——读宋代散文随笔之二	

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 (352)

第四部分 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对古典文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 (373)

研究文学遗产，不应脱离实际 (390)

尊重历史，正视现实 (403)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爱国思想的探讨

鲁迅论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 (423)

鲁迅评论文艺遗产、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 (442)

学习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的理论 (453)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第一部分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

谈谈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

——读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秦汉文学”一编

读了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秦汉文学”一编，收获很大。我此刻并不打算评论这一部书的全面的成就，只想谈谈文学史的编写问题。我感到文学史的编写，尤其是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有几个问题还值得研究和讨论。

怎样从“史”的角度来写文学史

游国恩等同志所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是“努力依照各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勾画出它们的面貌，同时还注意到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和相互影响，以及它们的源流演变”的。这部文学史“除有专章论述文学艺术的起源外，对各种文学形式的发生发展都有所论述，说明它们的发展线索和继承关系”。这是编者在“说明”中告诉我们的。从“秦汉文学”一编来看，编者对于一代文学的面貌是注意了它的发展演变和源流影响的。特别是关于文学形式的讲述，史的线索比较明晰。例如关于汉代散文、辞赋、五言诗等等的发展变化，对前代的继承关系和对后代的影响关系，文学史教科书都有适当的阐述。这些地方都体现着这部书的“史”的体系。但是，从“史”的角度来要求，其中仍有不足的地方，例如这种“史”的论述往往只是在讲文学形式的

时候比较突出，而在评论作家和分析作品的时候就有所忽略了。以《史记》为例，编者在讲这部著作的文学成就的时候，大体上是限于分类列举其中人物传记的形象描写的成就，指出作者歌颂什么，批判什么，分析其思想意义和艺术技巧，细节描写和性格刻划。这一切，如果作为一般的作品评论来说，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编写文学史的时候，就不应仅仅限于作品分析的范围，而是应该把一部作品放在全部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看它究竟比前代的作品有了哪些新的成就、新的特点。例如，关于《史记》中人物传记的描写，就不能不和前此的《左传》或《战国策》作些比较，从而具体地指出《史记》一书在描写人物方面究竟继承了什么、开创了什么。文学史评述作品，如能从“史”的发展角度落墨，我以为既可以区别于一般的作品评论，又可以更好地指出文学发展的脉络，从而也就有可能给予读者在一般作品评论中所不能得到的关于史的发展的知识。

还有，在文学史中分析作品，不但应该区别于一般的作品评论，还应该不同于一般的“作品赏析”。可惜的是文学史教科书在分析论述某些作品的时候，颇有写“作品赏析”的倾向。这里可以举《古诗十九首》的分析为例：

又如“凛凛岁云暮”一首描写一个思妇怀念良人，梦醒后惆怅感伤的情绪。这是一个蝼蛄悲鸣、凉风凄厉的冬夜，诗中的女主人思念着她的丈夫睡不着觉。她想到天气已寒，而游子还没有寒衣，想到寄锦衾，路途又是如此遥远。想来想去，忽然笃念旧好的良人枉驾来迎，她喜出望外地想，从此携手同归，长相亲爱，这是多么快乐呀！谁料那良人“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竟自无情地走了。心里十分懊恼，原来却是一梦。她当时恨不得飞到良人那边。引领遥望，好像良人还走得不远。此时这位女主人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只觉得凉风拂面，蝼蛄满耳，潮水般的眼泪直涌出来，沾湿了双扉。写到这

里，一个孤独无聊的思妇形象就如在目前。

编者写这一大段文字，用意是在讲述《古诗十九首》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的。编者用了捉摸情景的方法和欣赏玩味的态度来分析这一篇作品，想像不为不丰富，讲解不为不细致。但是，这样的分析，即令符合原作的本意，也只是停留在代替读者欣赏作品本身而已。至于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究竟有了多少新的艺术特点，却没有指点出来。这就是由于编者只把它作为一般的作品欣赏来分析，而不是放在文学史上、从史的发展的角度加以评述的缘故。

此外，还有像分析《史记·魏公子列传》时，编者指出作者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在评论《盐铁论·取下》时，编者指出作者用了十几个“不知”等等，这又是陷入了古文评点的范围。用这方法来评讲文章也是可以的，但这对于揭示文学发展中的艺术特点似无多少帮助。

在这部《文学史》中评述作品的部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这一部分缺乏“史笔”，势必削弱全书的“史”的体系。但上述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并不是个别的。我觉得这是值得商讨的一个问题。

如何贯彻批判的精神和科学态度

作为文学史，应当对古代作家、作品给以历史上的评价，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要不要从我们今天认识的高度去对古代的作家、作品进行批判呢？在我看来，写于今天的中国文学史，特别是文学史教科书，其区别于过去的文学史著作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更加具有这样的批判的精神。

游国恩等同志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是注意贯彻了批判精神的。具体表现是，文学史中对于许多作家、作品的评价，

注意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例如对于《古诗十九首》的内容的分析批判有些就是相当准确的，既指出了作家的思想倾向的阶级实质，又指出了作品的历史地位。这和过去某些研究者对于《古诗十九首》的盲目赞赏大不相同。书中指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乐府民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文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谒州郡，以博一官半职”。又指出：“《古诗十九首》中所流露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真实的反映”。还指出：“它们的思想价值虽不高，却也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这些分析，我觉得都是比较符合《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的阶级地位和他们的作品的历史价值的。

但是，作为“教科书”来要求，有些分析批判，又往往不够有力，特别是没有能够从我们今天认识的高度表现出批判的精神。像关于《史记》一书的评述，有些地方固然是准确的，有些地方便缺乏批判。在讲《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的时候，提到《刺客列传》，作了这样的分析：

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岂妄也哉！”

这是把司马迁对于刺客的看法引来了结论。我们知道，司马迁写《刺客列传》的时候，还不曾具有分析的态度。虽然称颂了某种可贵的行为，但与此同时，又把所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物都一律视为“不欺其志”而加以赞美。这是司马迁观点的缺陷，也是我们应该加以分析批判的。实际上，刺客们的行为，并非都是“反抗强暴”，在今天看来，也并非都是“可歌可泣”。像

象让和聂政的“自我牺牲”的行为，都只是报答一己的知遇之恩而已，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教科书在这里完全肯定了司马迁的观点，只是指出了“个人暴力行动”的局限性，而忘记了盲目颂扬这种“侠义精神”的危害性。究其原因，我想恐怕还是由于没有从今天认识的高度出发来考虑教科书的影响的缘故。

此外，还有像分析《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编者引用宋洪迈《容斋五笔》的话，说是“英姿雄风，千载之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生于宋朝的洪迈，对于毛遂佩服到“畏而仰之”，这并不奇怪，但可怪的是，今天的教科书编者竟对于洪迈的看法未曾加以任何批判便拿来算是自己的结论。又如讲《古诗十九首》的艺术风格时，也是不加批判地肯定了“怨而不怒”的说法。这一切，在我看来，也都是缺乏批判精神的。

强调批判精神，当然不是不讲究科学态度。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必须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因此，对于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不但要具有批判的精神，同样要求具有科学的态度。

这部文学史教科书的“秦汉文学”一编是体现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的。例如，在征引资料方面相当谨严审慎，经过了一定的鉴别取舍。有时在评论作品的时候，还常常引出经过考订的新的论据，不讲空话。作为“教科书”，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科书的科学性。但是，作为教科书的科学性，和某些考据文章又应该有所不同。教科书的科学性，在引据资料方面，应该更多地表现于引据的准确性，倒不一定在书中进行关于资料的考订。这部文学史教科书的“秦汉文学”一编有时似乎是重视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例如有时对于一个字，如“塞牖舍”的“舍”，详加论证（第161页），而对于某些史实的征引，则不够准确。例如第三章第一节讲到《盐铁论》这部书产生的原因的时候，有这样的叙述：

公元前八十一年，汉昭帝召集全国文学、贤良六十余人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讨论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

从这段叙述来看，好像是说关于“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的讨论是由朝廷发起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汉书·田千秋传》是这样说的：

（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

可见“盐铁之议”的兴起，并非朝廷所发动，昭帝召集文学、贤良之士，不过是例行“问以民所疾苦”，至于讨论盐铁，却非皇帝的初衷。像这样的史实错误，是应该避免的。

还有，在第四章第一节论证汉代乐府的兴起和统治阶级采诗的作用的时候，有这样的话：

两汉某些头脑比较清醒的统治者较能接受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也颇懂得反映人民意向的民歌民谣的作用，经常派遣使者“使行风俗”“观纳民谣”，甚至根据“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叙》）

这里引用《循吏传叙》，是为了证明统治者重视民歌民谣并将民歌民谣当作政治改革的借鉴的。但是，这里的引证也有错误。《后汉书·循吏传叙》曾经列叙了后汉吏治的变化，说到后汉早期的吏治之美时，曾指出“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又说到后来吏治之衰时，指出：“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可以看出，上面说的“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下面说的“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情。“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按：《循吏传叙》无“使行风俗”一语；“风谣”也不作“民谣”），确是根据风谣以为政治上的借鉴，但“以谣言单辞，转